

## 黄海章文学批评的学术理念与思想个性<sup>\*</sup>

李 松

**摘 要:**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研究生涯中,黄海章文学批评所形成的学术理念与思想个性主要体现在八个方面:强调文学本体研究、重视精神体悟、秉持知人论世的历史主义方法、区分学术性与功利性的边界、坚持学术个性与言说风格的统一、崇尚独立思考、保持人格独立、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薪火相传而鞠躬尽瘁。黄海章的文学批评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反映了激进的政治理念与独立的学术思想二者纠缠所造成的困境。为了实事求是地评价他的文学批评思想,需要运用知人论世和文本细读的方法,而不是先入为主或者断章取义,惟有如此才能理解他的学术研究思路、方法以及风骨。

**关键词:** 黄海章; 文学批评史; 学术思想

DOI: 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1.007

黄海章(1897—1989),字挽波,号黄叶,系近代著名诗人黄遵宪的同宗侄辈,中国当代重要的文学批评史学者。1919年秋,黄海章考入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即中山大学前身的文史部,自1936年任中山大学文学院中文系讲师,1941年任副教授,1943年任教授,在中山大学任教四十余年<sup>①</sup>。当前学界对于与黄海章同一时期的批评家,例如陈中凡、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等人的关注较多,却对黄氏着墨甚少<sup>②</sup>。与诸位文论大家比较而言,黄海章未获应有重视的原因是:前述著名的文论大家在民国时期已经出版了代表作,奠定了学术地位,形成了学术影响,而黄海章主要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术成果在建国之后才面世;他的著作较少,论文数量并不多;其研究成果被有的学者视为简单套用主流文学理论,因而被低估、冷落。本文认为,无论从黄海章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实际水准而言,还是他思想历程的阶段性和复杂性内涵,都不应低估黄海章作为古文论家的学术史价值。

\* 收稿日期:2018—06—0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中国十七年戏曲改革的史料整理与研究”(16YJA760017)

作者简介:李 松,武汉大学文学院、武汉大学中国文艺评论基地(武汉 430072)。

① 黄海章1981年的《漫忆平生》写道“我在中山大学前后凡历四十余年。”(黄海章《漫忆平生》,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部《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 第五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第321页)

② 目前研究黄海章的文学批评思想或者生平事迹的主要成果有:承学《黄海章教授谈治学》,《学术研究》1986年第4期;邱世友《记黄海章、詹安泰两教授的酬唱》,《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陈平原《花开花落浑闲事——怀念黄海章先生》,《读书》1993年第9期;李平《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综论》,《文艺研究》2003年第4期;黄念然《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中的历史叙述问题——以几部批评史著作为例》,《复旦学报》2004年第6期;陈平原、查建英《陈平原访谈:关于八十年代》,《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6期;吴定宇主编《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黄天骥《人淡如菊——记黄海章教授二三事》,《中大往事——一个学人半个世纪的随忆》,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李松《新中国十七年黄海章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厦大中文学报》第4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年。

## 一、强调文学本体研究

黄海章的文学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起步,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八十高龄仍然笔耕不辍,他主要的文学研究成就是在建国后十七年期间取得的。这一时期国内占主导地位的文学理论主要是马列文论以及马列文论的本土化产物毛泽东文艺思想。黄海章作为体制内的文学研究者,客观上难以避免、主观上不可能脱离毛泽东文艺思想。因此,理解黄海章的文学批评理念,一定不能脱离当时历史语境对于他的批评思想的影响。只有着眼于他一生学术历程的整体性与动态性过程,才能理解其真实的文学观念与学术信念。

黄海章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说“解放前,我主要从事文学史的教学,我最初研究先秦诸子,对唐诗也下过些功夫,曾开过《诸子通论》、《唐诗概论》、《中国文学史》等课程。解放后才开中国文学批评史课,后来研究重点也就转到古文论方面了。我的治学道路可以说是由治文学史走到治批评史的。”<sup>①</sup>正是因为黄海章从文学作品鉴赏、文学史研究出发,对文本细读下了很深的工夫,同时也形成了根据文本事实立论的思考习惯。因而他解放后进入文学批评史研究领域,没有脱离作品与文学史而空谈概念。他的学生吴承学介绍道“黄先生认为古文论研究者要注重艺术修养和理论修养。他认为中国古代文论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和具体作品的紧密结合,十分重视鉴赏经验。”<sup>②</sup>“如果我们不熟悉作品本身,没有审美经验,也就很难判断其批评是否准确了。黄先生一贯主张批评史一定要结合文学作品去研究,避免从理论到理论的凿空之言。研究中国古文论,需要比较广泛的知识面。如中国与外国的历史、文学艺术、宗教、哲学都要接触,然后从博反约。《易》《庄子》都是哲学书,但其中很多理论对批评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玄学、禅宗也是如此。不弄清这些问题,古文论很难深入研究。”<sup>③</sup>黄海章不仅在思想与方法上有沟通感性与理性、打通文史哲的自觉意识,而且在批评实践中也体现了融会贯通、厚积薄发的功力。

黄海章的学问广博通达,立足学术本身,坚持严谨的学理性分析。他指出:关于刘勰所谓“道”的涵义,近来的学者聚讼纷纭,或以为“道”即“自然”,或以为“道”是“儒家之道”,或以为“道”是“佛家之道”(如刘勰《灭惑论》所谓“至道宗极,理归乎一。妙法真境,本来无二。”),或以为“道”是儒佛两家思想的杂糅。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使读者头脑昏然,莫知所可<sup>④</sup>。难能可贵的是,黄海章认为“研究刘勰所谓‘道’的内涵,最好是根据《原道》篇所阐述的内容加以评论,不必笼统地提到哲学上唯心唯物之争上去。”<sup>⑤</sup>黄海章逐一指出了黄侃、刘永济、陆侃如三人观点的不合理处,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原道》篇,既阐述‘自然之道’也阐述‘圣人之道’(即儒家之道),不能取其一而去其一。如果刘勰所谓‘道’真的与‘圣人之道’无关,则下文《征圣》,《宗经》,根本上便不能成立。‘圣人之道’,虽不能和‘自然之道’等同起来,然而两者之间,又有其密切的联系。”<sup>⑥</sup>本文如上所述黄海章关于“道”的论辩,并非为了肯定他的观点的真理性,而是肯定其论证问题时严密的逻辑、严谨的思路以及客观的态度,尤其是立足于文本本身,避免落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说的窠臼。他以学术探讨为本位,没有批判的火药味,也没有拿流行的政治概念给其他学者“戴帽子”。

## 二、重视精神体悟

黄海章的文学批评强调个人化的精神体悟,这可以从如下他评价严羽的文学思想窥见。黄海章说:“他以禅喻诗,其实他对于禅学全无所解,钱谦益‘唐诗英华序’说:严氏以禅喻诗,无知妄论。谓汉魏盛唐为第一义,大历为小乘禅,晚唐为声闻辟支果,不知声闻辟支,即小乘也。谓学汉魏盛唐为临济宗,大历以下为曹洞宗,不知临济,曹洞,初无优劣也。他对于禅家所用的名词,还弄不清楚,更何能说到内容!”

①②③④ 承学《黄海章教授谈治学》,《学术研究》1986年第4期。

⑤⑥ 黄海章《续〈文心短论〉》,《中山大学学报》1963年第4期。

禅家为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不落言筌,本难以死法捉摸,而自证自悟,尤难以所得告人,沧浪教人一味妙悟,“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究竟如何悟法,方能入妙,说来亦恍惚迷离……说来说去,还是纠缠不清,弄不出一个明确的概念来,倒不如直捷了当主张性情,标举兴趣,来反对江西诗派的末流。不知禅而妄说禅,而且以禅说诗,多见其不知自量而已!”<sup>①</sup>黄海章如上对于佛禅具有深刻的见解,这与他的生活经历中的体验是有关系的。据陈平原记载“先生出世之想的时间大概不长,很快就重入红尘,先后任教梅县梅州中学、潮州金山中学,一九三六年起执教中山大学,直到以九十二高龄病逝于中山寓所。尽管先生晚年不断表示‘蓬莱无可到,梵土亦空悬。不佛亦不仙,蔬食任吾年’(《杂诗》),我还是相信年轻时的感情体验,终其一生无法完全抹去。诗集中随处可见游佛寺感叹‘凄凉佛子家’的诗作;当年杭州灵隐寺孤僧留影,普陀山木鱼携归,或者庐山青莲寺妙岸上人之约,更是让诗人刻骨铭心,几十年后不断‘回首前尘,恍如昨梦,诗以写怀’(参见《黄叶楼诗》)。”<sup>②</sup>黄海章学佛、入佛、事佛十分虔诚,他年轻时托词尽孝晚婚,新婚时吟诗两句“禅房作洞房,和尚变新郎”,一时传为佳话。

黄海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体悟式批评方式,也体现在他的文学史课堂教学之中。针对有人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简史》过于简略,还应该尽量扩充的建议。黄海章1981年在《漫忆平生》中说“我如果把我所要写的东西全部写出来,在课堂上讲授时‘照本宣科’,就得不到预期的效果。为取得教学效果起见,可以一边让学生留心教材的内容,一边把许多没有写出来的东西用口头进行讲授,或摘录一些笔记,这样,可以吸引学生,得到好的教学效果,这样教了几年,也还算马虎应付得来。”<sup>③</sup>黄海章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来自课堂讲稿,他对于何者需老师书上写、何者需老师当场讲、何者需学生读进行区分,提倡学生自主、师生互动,反对照本宣科满堂灌。据黄海章的学生黄天骥介绍“海老给我们讲唐诗。他身体瘦小,却声若洪钟,讲到激动处,唾沫直飞到讲坛上。他讲课的内容十分简洁,一是一,二是二,多余的话,一句也没有。对一些名篇,他不做分析,往往是摇晃着身躯,高声朗诵一遍,完了便问‘哪一句最好?’若某甲同学起来回答,不合海老的想法,他就摇头;某乙同学又站起来,说另外一句才好,海老满意了,便点头。然后说:关于对这首诗的评价,同学可以看什么什么书。这样一首诗的讲评,算结束了。”<sup>④</sup>他的讲课带着生命的激情与忘情的投入;其论述要言不烦,点到为止;其点拨崇尚无言之教,以心会心。“海老讲书,则是另外一种风格。他讲得并不动听,但很有启发。他讲诗,着重点在让学生自己体悟,而极少加上教师的意见。即使表示教师的看法,也点到即止。”<sup>⑤</sup>黄海章的文学教学尊重学生个人主观感受的独特性,不以标准答案为约束,实际上维持了文本的开放性和未完成性。正如陈平原所说,黄海章的研究方法,“重体悟能自得而不大重书本重理论的倾向,仍可能暗含玄机。先生的这种学术路数,与近代以来日渐专业化的大趋势格格不入,故在学界显得有点‘落伍’。好在先生从不追新潮,政治上、学术上都力戒‘从风而靡’,而是追求‘内有定见,外有定力’”<sup>⑥</sup>。黄海章教学与治学的理念来自多年实践的检验,体现了他对文学与教学本质的理解。

### 三、秉持知人论世的历史主义方法

针对《沧浪诗话·诗辩》,黄海章评价说“大体说来,沧浪原本性情,主张兴趣,反对江西诗派之掉书袋,发议论,在当时来说,是有其进步性的。可惜这种主张,偏而不全。而其最大的毛病,是以为时代愈后,诗道愈衰。大历不如盛唐,晚唐又不如大历。强执时代的先后,以为盛衰的界限,这样推演下去,是一代不如一代,最好是返诸诗经三百篇以前。这种看法,是完全违反文学发展的规律的。”<sup>⑦</sup>黄海章的

①⑦ 黄海章《谈严羽的“沧浪诗话”》,《光明日报》1958年3月9日。

②⑥ 陈平原《花开花落浑闲事——怀念黄海章先生》,《读书》1993年第9期。

③ 黄海章《漫忆平生》,第323页。

④⑤ 黄天骥《人淡如菊——记黄海章教授二三事》,《中大往事——一个学人半个世纪的随忆》,第196—197,197页。

这一判断基于文学史事实,批驳严羽机械性地“强执时代的先后,以为盛衰的界限”,以至形成了“退化论”观点。

对于《沧浪诗话·诗法》中的如下说法“诗之是非不必争,试以己诗置之古人诗中,与识者观之,而不能辨,其真古人矣。”黄海章认为,今人欲做“真古人”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他的理由是“他不知道做一个‘真古人’,便要完全丧失了‘自己’。我有我所处的社会环境,我有我自己的生活遭遇,我有我自己的思想感情,发为诗歌,便有我自己的特殊的内容与风格,何必要做一个‘真古人’?又何能勉强做一个‘真古人’?沧浪可不是说诗所以吟咏性情么?做一个‘真古人’,试问‘真性情’何在?这简直是自陷矛盾而已!”<sup>①</sup>黄海章认为,诗人不同的社会环境、生活遭遇与思想感情会形成个人独特的内容与风格,因而勉强“以己诗置之古人诗中”不可能复原为“真古人”。

黄海章上述研究路径,从他后来的治学经验总结中也可以了解。他认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有许多方法,但总结起来不外‘史’‘论’两种。‘史’的方法就是把研究对象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里去考察,探求其真正的历史面目和本来意义,尽量避免渗入主观臆测。这就要求研究者要占有大量第一手资料,而且要了解其广泛的历史文化背景,了解批评家的思想生平,知人论世。‘史’的方法是最基本的工作,也是最实在的功夫。‘论’则是从我们今天的眼光去评价古代文论,可以有自己言之成理的见解。用现代的理论去探讨批评对象在历史上与今日的意义和作用,但并不是用今人的标准去贬低或者抬高它们。现在有些理论文章,写得很漂亮,但却缺乏扎扎实实的史的功夫,主观色彩很浓,往往浮光掠影,有些人连原意都搞错了,有的则断章取义,其结论是靠不住的。也有的人喜欢夸大其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在古人头上,搞古人现代化,把古人说得比今人还高明,这是不科学的。”<sup>②</sup>黄海章并不是一般性地反对理论预设,而是强调史实的基础性,反对理论先行和过度的主观阐释。有些人往往夸大其词抬高古人,他认为并不科学。

## 四、区分学术性与功利性的边界

### (一) 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

黄海章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是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期间具有代表性的批评史著作,与之前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27)、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1934)、罗根泽的《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1934)、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1934,下卷1947)、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1944)、刘大杰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64)并肩而立,各擅胜场。该书以“概说”作为总论,勾玄稽要,提纲挈领。全书涵盖儒家、道家、两汉、魏晋、南北朝、唐代、宋代、金代、明代、清代十个部分。他在“概说”中论述了批评史的元命题,至今仍有学术价值。

#### 1. 何谓中国文学批评史

黄海章开宗明义,提出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描述性定义:“中国文学批评史包括的范围,是在阐述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及其演变的历史,其中自然包括对历代某些作家和作品的批评。”<sup>③</sup>由此可以看出他对何谓“中国文学批评史”具有清醒的理论自觉,将历史书写与客观历史进行了区分。作为学科的概念形态,批评史是主观叙述的产物,即对于“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及其演变的历史”的“阐述”。作为客观的历史形态,中国文学理论发展、演变具有自身的历史过程,研究者应该基于这一历史事实进行评价与分析。黄海章这一界定体现的研究特色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并非文学理论的批评史,其研究不能局限于概念与理论的范围,而是“其中自然包括对历代某些作家和作品的批评”。他毫无疑问地指出“文学作品,是先于文学理论。”<sup>④</sup>而书写形态的文学批评史就是基于作家、作品的批评历史。这是黄

① 黄海章《谈严羽的〈沧浪诗话〉》,《光明日报》1958年3月9日。

② 承学《黄海章教授谈治学》,《学术研究》1986年第4期。

③④ 黄海章编著《中国文学批评简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1页。

海章的批评史观念与批评史书写的实践性特色,并不悬置作家和作品而空谈文学理论。

黄海章认为,从文学发展的过程来看,文学作品与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呈现为如下三种状况。第一,文学作品先于文学理论。例如《诗经》中的风、雅、颂都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并非受文学理论的指导才创作出来。第二,文学批评是在文学作品流行之后才产生的,反过来会给文学以重大的影响。“譬如有了《诗经》,读诗的人,才各提出他们不同的看法。”<sup>①</sup>孔子、孟子、荀子、汉代儒家关于《诗经》的看法“出发点,各有不同,结论也全不一致,而且都不是完整的批评,但总不能不说是雏形的文学批评”<sup>②</sup>。第三,文学批评和理论的出现有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碎片式的文学批评首先散见于六经、诸子当中;曹丕、陆机、挚虞等人的出现意味着专门从事文学批评的人的出现。从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至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意味着有条理、有系统、有深度的文学批评,实际上逐渐形成了“由破碎而逐渐趋于完整的”<sup>③</sup>观念形态的文学理论。

## 2. 中国文学批评历史与观念的复杂性

第一,从发展历史来看,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观念互相冲突,影响各异,有的同时并存杂糅,有的异代相左。“在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中,有些是含有现实主义文学的因素,可以推动文学向前发展的,有些是属于唯美主义、形式主义,会把文学拉向后退的。文学史上进步的,向上的,和落后的,反动的,两种矛盾的斗争,在文学批评史上也同样的显现出来。”<sup>④</sup>黄海章揭示出观念的冲突并非一定出现于批评家之间。例如,王充反对东汉文坛虚伪浮夸的文风,但是他反对的是这种文学潮流,而在当时并没有出现与他持相反看法的批评家。他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双方斗争同时出现,却以明清两代为最著”<sup>⑤</sup>。例如公安、竟陵之于前后七子,袁枚之于沈德潜。

第二,他辩证地指出,某些批评家自身进步与落后的观念集于一身,不可一概而论地拔高或者贬低:“在过去号称进步的向上的文学批评家中,他们自身也有许多矛盾,也有一些落后的反动的因素。”<sup>⑥</sup>他认为刘勰看到了文学和时代、作者个性的关系、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以及文学的发展演变过程,这是进步的;而过于推崇孔子和六经,过于强调政治对文学的影响,则有所偏颇。黄海章主张“我们在这种交互错综的情况下,对一些进步的、向上的文学理论和批评,自然要加以充分的吸收,但对其中落后的、反动的成分,也要加以严格的批判。这样,才不会迷信古人,才能够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sup>⑦</sup>他认为沈约是趋向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作家,但不应该因此而否定他提出的“易见事、易识字、易诵读”的见解。虽然黄海章的文学批评也有时代政治的印记和影响,但是让学术成为政治的附庸的话,却是他根本无法接受的,以文学的方式谈文学,或者从文学的角度谈政治,是他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底线。

### (二) 文学的“新”与“旧”

黄海章的文学观点与当时意识形态有吻合、一致之处,但也有着个人的独立思考。1964年戏剧界提出“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之陈,出社会主义之新”的观点,即“过去所演古典的戏剧,不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范围,不能反映当前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所以大力提倡现代剧,来反映建国十四年来伟大的新人新事”<sup>⑧</sup>。在当时,戏剧界原来提出的“两条腿走路”与“三者并举”逐渐演变为以反映当下生活为主的现代戏。那么,在中国古典文学史的教学是否能贯彻这种方法?当时有两种看法:第一,“如能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把古典文学加以深入分析批判,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就能‘出社会主义之新’”;第二,“运用历史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史,写成一部新的、合乎现代社会要求的教材,也就是‘出社会主义之新’”<sup>⑨</sup>。这两种看法在当时的学术界占有主导地位。然而,对于上述观点,黄海章表示了鲜明的反对意见。他的理由是“前一种说法‘推封建主义之陈’,诚然做到了,但吸收过来的‘民主性的精华’那部分,亦止成为‘民主性的精华’而已。那些‘民主性的精华’,在社会主义伟大的建设时代,亦止能有‘借鉴’的作用,是否这样,就算‘出社会主义之新’?可以反映当前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呢?后一种看法‘推封建主义之陈’,也诚然做到了,

①②③④⑤⑥⑦ 黄海章编著《中国文学批评简史》第1,1,2,3,4,4,4页。

⑧⑨ 黄海章《在古典文学教学中不可能出社会主义之新》,《学术研究》1964年第2期。

但所写成新的、合乎现社会要求的教材,也止能做到以新的观点,处理旧的材料,里边虽然有不少新的见解,但也止限于处理旧的材料范围而已,是否这样就算反映了当前社会主义伟大的建设?就成为‘出社会主义之新’呢?”<sup>①</sup>

黄海章的理由是,对于能否“出新”,要根据不同的学科区别看待。他说“我以为在创作小说,尤其是创作现代剧方面,可以达到这种要求,至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史,范围既然是‘古典’的,能真正做到‘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便算完成了任务。那些经过深入批判的得来的‘精华’,也可算是推陈出新,但决不能说‘出社会主义之新’;也决不能以‘出社会主义之新’在古典文学史中来达到这种要求。”<sup>②</sup>可见,他并不是简单地否定“推陈”可以“出新”,而是认为,古典的学问与满足现代所需要的“社会主义之新”即功利性需求,应该区分开来。黄海章具体分析:“我以为在教学方面,须分别课程的性质,来作不同的要求。教中国古典文学史的,范围既然限于古典,无论有若何新的见解,在当前的社会,能起一种作用,也不能成为‘出社会主义之新’。至于研究‘甲骨文’、‘金文’一类的‘古文字学’,也未尝不可以拿出新的见解来,但距离‘出社会主义之新’更远。如果用同一的尺度,对不同性质的课程,作同一的要求,我以为是无法达到的。”<sup>③</sup>黄海章的主旨是,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展,不能直接地、简单地、急迫地为现实需要服务。他没有明说的是,出“社会主义”之“新”是一种现实政治要求,如果以此为标准去剪裁古典文学,则难免指鹿为马,歪曲古典文学的本来面目。按照当时学术研究的时代要求,从古代文学研究提取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观念与情感取向,是“古为今用”的需要。但是,黄海章坚持认为,在古典文学教学中不可能出“社会主义之新”。他的这一看法揭示了文化遗产功利目的的实现存在复杂的、差异性的状况,因而不可一概而论。他在当时提出这一说法,体现了一定的学术勇气和求真品格。

## 五、思想个性与言说风格的统一

### (一) 摭摭要义,挈领提纲

黄海章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条分缕析,脉络清晰,简明扼要,不仅上面所述是为了满足课堂教学的需要,实际上也是个性化的言说风格使然。他说“我平生治学,重在摭摭要义,挈领提纲,往往失之‘粗枝大叶’,但比较‘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的,似乎稍胜一筹。”“现在人写文章,喜欢长篇大论,下笔万言,犹嫌太短,我以为为节省读者时间起见,似乎还可以精简一些。”<sup>④</sup>1958年3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黄海章的《谈严羽的〈沧浪诗话〉》,该文体现了黄海章“摭摭要义,深入浅出”的文学批评风格与旨趣。

黄海章针对严羽作《沧浪诗话》以禅喻诗说,以为“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他评价道“韩退之的诗,好卖弄学问,好发议论,好驱使险韵,和孟襄阳之平淡天真,风格迥然不同。严羽尊孟而抑韩,是以为襄阳的诗由深思自得而来,而非根本于学问。他的主旨,是在反对当时盛行的江西诗派,使诗的创作,归于含蓄,而有一唱三叹之风。”<sup>⑤</sup>三言两语,条分缕析,如老吏断狱,区分差异,追根溯源,切中要害。黄海章评价江西诗派说“这一派的诗,从它的好处看来,是雄大、劲健、拗折、沉郁,有杜甫之余风,而其短处,是在于驱使才学,驱使议论,驱使典故,有韩愈之僻涩险怪,无一唱三叹之音。而且以为诗是局限于书本中,而忽视了作者的真性情。”<sup>⑥</sup>点评到位,干脆爽利,体现了批评者深刻的识见与涵养。黄海章的上述风格特征,可以从他自己的治学心得中得到印证“文章有深入浅出、深入深出、浅入浅出,浅入深出之分。我以深入浅出为最上乘,浅入深出最无谓。”<sup>⑦</sup>黄海章的文学批评不仅仅是有风格上的独特性,也是

①②③ 黄海章《在古典文学教学中不可能出社会主义之新》,《学术研究》1964年第2期。

④ 黄海章《漫忆平生》第323页。

⑤⑥ 黄海章《谈严羽的〈沧浪诗话〉》,《光明日报》1958年3月9日。

⑦ 承学《黄海章教授谈治学》,《学术研究》1986年第4期。

一种“深入浅出”研究方法与表述方式的体现。

黄海章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建立在长期丰富的文本鉴赏的基础之上,同时作为从事创作实践的诗人,他的理论分析往往对批评文本有同情之理解,能避免空蹈虚谈,强作解人。黄海章撰写的《明末广东抗清诗人评传》<sup>①</sup>将研究对象简明地分为三类:即“死难的抗清诗人”、“参加战斗后退隐的诗人”以及“退隐的诗人”,除此之外,将“方外诗人”等作为附录。从诗作本身进行品鉴,是为“摭摭要义”;从分类明晰的角度区分各自的边界,是为“挈领提纲”。

## (二) 抒情与言志的统一

黄海章是自成一家、求真务实的著名学者,也是才华超拔、造诣极深的优秀诗人。他曾刊行《黄叶诗钞》(1945),该作品传诵一时,其续作结集为《黄叶楼诗》。黄海章在《黄叶楼》“后记”中自述其创作追求“自念从旧社会中来,犹存在不少落后的思想意识,然而抒怀述事,尚不失其真。”<sup>②</sup>《黄叶楼诗》一书合计收诗220首,分为如下七个部分:1.《黄叶诗稿》系根据黄海章诗歌毛笔手迹选印;2.《黄叶楼诗(选录一)》(50首)涵盖范围最广,自青年至晚年的作品;3.《黄叶楼诗(选录二)》(93首)主要选录1976年之后的作品;4.《黄叶楼诗(选录三)》(31首)主要选录1984年之后的作品;5.《补遗》(11首)其中10首都是1976年之后的作品;6.《黄叶楼诗(选录四)》(29首)编为《烬余集》(解放前作);7.《附词》(6首)。从作品分期来看,解放前作品约占百分之十三,解放后至1975年间作品约占百分之七,1976年及其以后作品约占百分之八十。其主要内容包括胜地游记、遣兴抒怀、抨击时弊、表达政见。缘事而发,没有无病呻吟的矫情之作。正如邱世友探讨黄海章与詹安泰数十年诗词酬唱之后所说“二位先生通过这样的创作活动,培养了友谊,剖析了人生,家国身世之感又互相交流、深化,从而体现了一个时代的时代精神。”<sup>③</sup>诚哉斯言,表达、呼唤并引领“时代精神”是黄海章创作的基本动机,也是诗歌内容的主要特色。

## 六、崇尚独立思考

黄海章说“我对问题往往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轻易崇拜权威。当然权威之所以成为权威,由于他有卓越的成就,但对权威决不能一味顶礼膜拜。”他的毛泽东诗词研究具有个人的独到见解,求诸己心的精神十分可贵。

1963年《毛主席诗词》出版,1964年元旦在全国各地开始发行。《人民日报》、《红旗》等报刊杂志连续发表郭沫若、臧克家等人诠释毛泽东诗词的文章。中山大学中文系从1958年开设了“毛主席诗词研究”课程。据《中山大学校史》记载:在“为建设共产主义的中山大学而奋斗”的口号下,从1958年6月下旬起,中山大学提出了改革教学与改革科学的“双改运动”,学校的五大措施中有一项是开设富有时代特色的课程,其中就有“毛主席诗词研究”、“毛主席语言研究”。这次运动从1958年6月下旬开始至1959年上半年结束,历时一年左右<sup>④</sup>。黄海章坚持文学批评的标准,在毛泽东诗词阐释中提出了自己的解读方法和结论。

### (一) 关于《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一首

“钟山风雨起苍黄”,“苍黄”两字,郭沫若解为“变化反复”,引伸为“天翻地复”<sup>⑤</sup>。黄海章以为“苍黄”即是“仓皇”。他的理由是“韩愈《祭女挈女》:‘苍黄分散’,即是‘仓皇分散’。杜甫《新婚别》:‘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宋蔡梦弼注云‘谓行役之急也。’可见‘苍黄’是可只当‘仓皇’用的。仓皇两字,用在这里,我以为有重要的意义。国民党反动派据守南京,他们以为‘长江天堑,不能飞渡’,而且有

① 黄海章《明末广东抗清诗人评传》,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② 黄海章《黄叶楼诗》,香港:旅港梅州中学校友会,1986年,第75页。

③ 邱世友《记黄海章、詹安泰两教授的酬唱》,《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④ 吴定宇主编《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第275页。

⑤ 《百万雄师过大江》,《人民日报》1964年1月4日,第2版。

英美帝国主义的舰队封锁着,人民解放军更无飞渡的可能,他们还可以苟延残喘。料不到人民解放军突破封锁,百万雄师,迅速渡过长江,暴雨狂风,骤然卷起,他们于万分惶恐之中,仓皇逃去。这一方面刻画出解放军威力,雄大无比;一方面刻划出国民党反动派,狼狈逃跑。解为‘天翻地复’,便不能显示出这种意思来。而且下面又有‘天翻地复慨而慷’之句,意义也不免重复。”<sup>①</sup>他旁征博引疏解“仓皇”的本意,然后结合上下文语境论证其内涵。

### (二) 关于“不可沽名学霸王”

许多人都认为是项羽沽名钓誉,要行仁义,不肯杀掉刘邦。结果弄到乌江自刎。“由于要行‘仁义’,因而穷寇不追。由于穷寇不追,因而一败涂地。”<sup>②</sup>对此,黄海章的质疑是:(一)项羽最初所要消灭的对象,是暴秦的军队,不是和他联合作战的刘邦;(二)刘邦拥有十万军队,先项羽而入关中,也不能算是‘穷寇’;(三)等到楚汉纷争,刘邦成为项羽所要消灭的对象,然而他所凭藉的是武力,并非欲钓仁义之名。司马迁批评他说‘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这便是他终身迷信武力的证明,决非‘要行仁义’。”因此,黄海章说“我以为所谓霸王,可能是指历史上领导农民革命的领袖如洪秀全等人,打到南京,便以为功成名立,坐下来做太平天国的皇帝,不肯把革命进行到底。这样解释,似乎和上句‘宜将剩勇追穷寇’联系得紧密一些。”<sup>③</sup>他认为此处将项羽解释为“霸王”,就历史实际情形而言并不吻合,而解释为洪秀全等人则符合诗句的本意。

### (三) 关于《到韶山》七律一首

“红旗捲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臧克家认为这句诗的意思是“追忆了当年农民在党的领导下,高举红旗,奋起革命,打倒地主,夺取政权的情况。仅仅两句,但极具体形象地写出了人民的斗志和英勇。”<sup>④</sup>郭沫若以为“黑手高悬霸主鞭”,是“反革命的黑暗势力高高地举起了恶霸地主们的铁鞭或者皮鞭——以反革命的武装力量来对抗革命的武装力量”<sup>⑤</sup>。黄海章认为“依前一说,两句都是歌颂农民的斗志和英勇,都是正面的形象;依后一说,前后两句的形象,刚刚相反,意在说明农民的力量,在恶霸地主残酷的压迫之下,在流血牺牲中成长起来。各有各的理由。”黄海章比较赞同前一个解说。他的理由是:“有些同志以为把‘黑手’当作农民的形象,可不是大大地污辱了农民高贵的品质?其实并不是这样。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谈到农民协会的农民们有说‘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黄海章分析说“根据这种情形,也可能是农民捆绑劣绅游乡时,一手牵着绳子,一手高高地举起以前恶霸地主们鞭打他们的鞭子,督促着劣绅前行。这种形象,也是很生动的吧!”<sup>⑥</sup>黄海章上述对于毛泽东诗歌的解释,结合诗句,贴近语境,有理有据,堪称新解。

黄海章回顾自己的研究宗旨时说“研究应该‘谢朝花之已披,启夕秀之未振。’创造性是科研工作者的必要素质,学术界应提倡独立思考的精神。现在有一些‘热门’,如某个批评家、某个术语便有大量的文章,但许多是人云亦云,缺乏创造性。另一方面,也有人把创造性片面理解为标新立异,以为凡‘新’凡‘异’必好,凡旧说必欲推翻。但往往言不成理,有些翻案文章连旧说也没有完全了解,只求唱反调,这未免哗众取宠。其实‘新’‘异’并不等于创造性。创造性必须合乎科学真理。能推翻千古定论,自创新说,又言之成理,当然很好,但这情况是极少的;如果能在前人或他人基础上把研究推前一步,或者从其他角度,用其他方法使研究更周密更深入,‘前修未密,后出转精’,也未尝不含有某些创造性。”<sup>⑦</sup>黄海章认为,学术创新追求术语之新、唯新是求、为新而新、片面之新,往往并不符合实际。在现有基础上求新,求角度之新、方法之新也具有创造性价值。

①③⑥ 黄海章《读毛主席诗词十首》,《中山大学学报》1964年第2期。

② 《百万雄师过大江》,《人民日报》1964年1月4日,第2版。

④ 《时代风雷起新篇》,《诗刊》1964年第1期。

⑤ 《敢教日月换新天》,《人民日报》1964年2月8日,第5版。

⑦ 承学《黄海章教授谈治学》,《学术研究》1986年第4期。

黄海章曾经在《漫忆平生》中引用王阳明和颜习斋的两段话,集中体现了自己的批评理念与思想个性。第一段话强调为学贵在“求之心”,而非盲目崇拜权威“王阳明说‘夫学贵求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王阳明诚然是主观唯心主义者,然而他这一段话,要人们能独立思考,不要一味迷信‘权威’,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sup>①</sup>第二段话强调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重要性“颜习斋也说‘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是,则一二人之见,不可易也;非,则虽千万人所同,不随声也。’(钟铨著《颜习斋言行录·学问篇》)。”<sup>②</sup>斯人已逝,遗韵长存,上述两段话体现了黄海章追求真理的学术理念与独立思考的思想个性。

## 七、保持人格独立

黄海章在中山大学耕耘近半个世纪,桃李无数,名满天下。校友们称颂“先生冲淡温良,虚怀若谷,对门生一视同仁,对学业循循善诱,赢得全校爱戴,感情历久不衰,迄今天下桃李相逢,无不以海师为念也。”<sup>③</sup>黄海章不仅仅为师为学受人敬重,他独立的人格姿态也体现了学者的风骨和尊严。吴承学回忆黄海章的思想境界,写道“他强调治学需要高尚的人格,牵于名缰利锁见风使舵的人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成就。他喜欢用韩愈的话来勉励我们‘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sup>④</sup>

黄海章认为“科学研究也需要高尚的品质,决不从风而靡”。他说“在‘四人帮’横行之时,出现一些‘风派’文人,不惜改变自己一贯见解来迎合‘四人帮’,‘四人帮’垮台后,乃成为众矢之的。‘风派’文人,喜欢观风察色,自以为永远站在时代的前头,殊不知风头一转,他不得不因风转舵,又不免落在时代的后头了。这样变来变去,便成为无行文人。这种人完全为利欲所驱使,自然不会有真正的学术成就了。”<sup>⑤</sup>这里所说的“‘风派’文人”或暗指同校哲学系杨荣国教授。1974年1月,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杨荣国成为当时意识形态的宣扬人。黄天骥回忆道“海老对外面的风风雨雨,当然是不解的。他足不出户,却对是是非非,非常清楚,而且敢于坚持自己的看法。有一次,有位知名学者受了上头的委托,大写‘评法批儒’的大批判文章。此公一时名满天下,炙手可热。他误上贼船,身不由己。知识分子既迂又软容易忘乎所以的习性,使他真的挖空心思为‘四人帮’的理论效力。为了评说‘法家’的传统,他想到了汉代的重要思想家王充。而对王充思想如何阐述,却未有把握,便‘降贵尊’,请教海老。海老一听他说要把王充定为法家,猛摇其头,坚持王充是儒家,并且认为儒家不应受到批判。他以自己的良知,坚持真理。那位学者告诉他这是政治需要,请他帮忙,海老就是不肯。”<sup>⑥</sup>杨荣国请教黄海章的动机是,试图将王充定位为法家,他的目的是配合当时评法批儒运动的政治需要。杨荣国的观点背后有政治潮流的驱动,据他的同事李锦全介绍“当时按照杨荣国的观点,先秦是有儒法斗争的,汉代以后有没有呢?很难说。后来,毛主席委派迟群主持召开法家著作会议。江青关心这个问题,她说,儒法斗争不止是先秦有,汉代也有;不单是古代有,现代也有,将来也有,永远都有。儒法斗争跟阶级斗争一样,永远都要有。杨荣国本来认为,先秦肯定是有儒法斗争的,汉代以后他不确定存不存在儒法斗争,但是会议开完以后,‘认识’统一了,认为儒法斗争汉代以后也是一样存在的。”<sup>⑦</sup>这一史实就是黄海章上面所说的“从风而靡”,“不惜改变自己一贯见解来迎合‘四人帮’”<sup>⑧</sup>。

黄海章说“我在十年动乱中虽然没有进入‘牛棚’,然而汲汲遑遑,精神上受到不少刺激。又由于

①② 黄海章《漫忆平生》,第324,324页。

③ 黄海章《黄叶楼诗》,第1页。

④ 吴承学《我们缺少的是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南方都市报》2013年12月12日。

⑤⑧ 承学《黄海章教授谈治学》,《学术研究》1986年第4期。

⑥ 黄天骥《人淡如菊——记黄海章教授二三事》,《中大往事——一个学人半个世纪的随忆》,第198页。

⑦ 李锦全、杨澜洁《“评法批儒”中的杨荣国》,《北京青年报》2014年12月19日。

‘四人帮’横行，硬要教育界和十七年前对着干。”<sup>①</sup>20世纪70年代初，他写有《闭关》一诗，表达了个人的精神独立：“颂酒未能聊瀟茗，藏书不读且看山。鹃花落尽人非故，万绿摇天自闭关。”他在《一九七六》这首诗中描述了中国当时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表达了对于廓清乱相的狂喜：“地动天摇日，风号鬼啸年。唐山卅万众，一霎化飞烟。‘四害’横中夏，群生堕九渊。豁然妖雾净，日涌万山颠。”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黄海章在致友人潘汝瑶的《劫余》中写道：“劫余留得一闲身，江畔相从影倍亲。恶梦十年休复忆，春风重过草如茵。”（上述诗作均见于《黄叶楼诗》）这首诗表达了他走出黑夜梦魇，迎接政治清明的欢快心情。

## 八、为薪火相传而鞠躬尽瘁

从陈平原所说的当代学术史上的“隔代遗传”现象，可以发现黄海章及这一代人学术思想的远因与近果。陈平原认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学术有一种“隔代遗传”现象<sup>②</sup>。“八十年代的我们，借助于七八十岁的老先生，跳过了五六十年代，直接继承了三十年代的学术传统。比如，我在中大、北大念书时，先后接触了容庚、王季思、黄海章、吴宏聪、王瑶、林庚、吴组缃、季镇淮等一大批老教授，他们大都曾就读于三十年代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或抗战中的西南联大。因为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他们没办法很好地表现；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在学术上‘重新焕发青春’。这不是比喻，是写实。这些老先生，无论做人还是治学，一下子回到了三四十年代。注意，不是回到强调思想改造的五六十年代，而是回到最初接受学术训练的三十年代。抗战前，中国的大学已经很成样子，数量不多，但质量很好。那个时候活跃在大学校园的诸多人文研究方面的大家，他们的业绩，今天仍然很难企及。学生更是如此，那个时候的大学毕业论文，比今天的硕士论文还好。这就难怪，八十年代的学术，不属于承继五六七十年代，而是回到三十年代。”<sup>③</sup>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学术继承上的跨越性与跳跃性，说明外部的强力压制可以在一时一地起作用，但是无法从精神信念上改变学者的情怀与寄托。其实不止是中大、北大存在这种现象，每一个人文传统深厚的大学都是如此，例如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名校，一些硕果尚存的老教授重上讲台，备受学生尊崇。因此，理解20世纪80年代学术史的精神背景，有必要联系民国学术传统的跨代影响。陈平原的“隔代遗传”说勾勒了一幅弥补文化断层、接续学术香火的图景。他的具体理由是“第一，这些人大都受过较好的中学、西学的训练，是正规军，不是游击队，跟日后那些靠大批判起家，或者从大批判入手接受高等教育的，无论学养还是境界，都大不一样。只是由于长期的压抑，他们很可能著述不多，或名气不是很大。第二，由于早年良好的教育，加上长期的生活磨炼，这些人大都有一种睿智，一种人格魅力。这点很重要，从他们身上，年轻一辈学得的，主要不是具体知识，而是治学态度，以及所谓的学术精神。第三，我们接触这些老先生们时，彼

① 黄海章《漫忆平生》第322页。

② 关于“隔代遗传”这个说法，有人提出不同看法，陈平原后来对此进行了具体的解释和补充。他认为“我说的是大趋势，不针对具体学者。上世纪50年代培养的大学生有非常出色的，我没说他们都不行，只不过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在我们进大学的时候还没调整好学术姿态。进入八九十年代以后，这代人中的佼佼者，其才华方得到很好展现。至于70年代末，思想解放大潮中，学术也在急剧转向，老一辈学者因为‘没有改造好’，很容易回到三四十年代的大学传统。中年一代解放后上大学，经过诸多政治运动的洗礼，留下很深的印记，转过来不容易。我们则因为念书少，底子薄，转弯转得快。因此，我们这一代人念本科及研究生阶段，确实更多地受民国时期老学者的精神风范、学术态度乃至治学方法的影响。中年这一代日后很多调整到位做得很不错，不能因为我说的‘隔代遗传’否定他们的业绩，那样不公平，也不是我的原意。”（参见李怀宇、郭杨《陈平原“一生而历二世”》，《时代周报》2011年9月8日）葛兆光对于“隔代遗传”的不同见解，可以参见李怀宇《葛兆光：去掉脉络化，去掉熟悉化》（《北京青年报》2014年3月14日）。实际上，陈、葛二人并无原则分歧，只是通过不同经历和角度的叙述，共同呈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老中青三代学人的思想处境以及彼此之间的学术承传与交谊。

③ 陈平原、查建英《陈平原访谈：关于八十年代》，《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6期。

此之间不构成竞争,没有利益冲突,因此很容易推心置腹。他们早就成名了,也乐意提携年轻人,当伯乐。老少之间,思想比较接近,学术上也谈得来,没有多少隔阂,这样,一下子就回去了。再说,老先生们年纪大,地位高,碰到风浪时,仗义执言,这点让我很感慨。或许是经历过的事情太多了,加上无所求,‘无欲则刚’嘛。”<sup>①</sup>这一批人文社科领域硕果仅存的资深学者,之所以跨过极端的年代仍然能够自然地承续早期接受的学术精神,就在于面对一系列思想改造的同时也坚持着宝贵的学术品格。王水照在评价原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的知识分子群体时,认为他们徘徊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潜藏着两股“势力”:“一股就是党的声音、党的政策,你必须要执行,而且何其芳也的确是相当忠实地去执行的;另外一股呢,就是学术本身的,要讲究学术的独立思考、自由研究,要尊重科研工作自己的规律,这种思想在第一批老先生身上,也包括在青年大学生身上根深蒂固,不是说推翻就推翻,说改造就改造的,甚至何其芳他们自己也是如此。”<sup>②</sup>包括黄海章在内的这一批老先生老树新枝,晚年焕发青春光彩,培养了大批80年代开始学术研究的青年学者。

黄海章认为,文革结束之后的人才培养十分紧迫,他将人才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高校岗位中的“年青的一代”,特别强调“培养年青的一代是很重要的。再不好好地培养,大专院校的前途是很危险的”<sup>③</sup>。原因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也留下了许多青年教师,将来的教课任务,就要轮到他们身上。诚然,他们经过努力,可能比我们老一代强得多,但这不能说空话。现在一切趋向年轻化,但不是年轻便好,还要有相当的能力。”<sup>④</sup>第二类是中年教师,“现在一般在大专院校任课的中年教师,学问上有较好的基础,教学也有二十年以上的经验,负担课务,是结实可靠的”<sup>⑤</sup>。第三类是当时在校的研究生,“现在大学的一般研究生,将来也有许多要负起大学教学任务来的,所以必需经过好好地培养”<sup>⑥</sup>。“他勉励青年戒骄戒躁,不慕虚名,不急功好利,要耐得寂寞,沉得住气,力戒浮夸之风,认准自己的目标,一直走下去。”<sup>⑦</sup>“文革”初告结束后,黄海章和几位老师合教《古典文学作品选读》和《毛主席诗词研究》,也分任了一些编写事宜,同时把《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大纲》绝大部分没有写完的稿子继续写下去<sup>⑧</sup>。黄海章身体力行,积极投身新时期的教育事业,与中山大学中文系的耆宿鸿儒合作,开始培养、指导中国文学批评史方向的研究生,直到八十九岁才退休。

## 结 语

黄海章一生经历极其艰难坎坷,学术道路跌宕起伏,但是无论何种困厄窘境,他始终坚守人生信念,追求学术真理。王水照曾评价何其芳一方面要“执行党的政策”,“这是义不容辞的”;另一方面,“学者本身又要坚持学术的独立性,坚持按照自己的学术兴趣与学术主张去搞研究,这虽是潜在的,却又是发自内心的、深入骨髓的。这两股势力,在何其芳身上经常‘打架’”<sup>⑨</sup>。应该说,这种心灵的“打架”现象在老一辈知识分子身上是普遍的、根深蒂固的。这一段评价也符合黄海章的思想状况。他年逾八旬终于迎来了思想解放的大好局面,主张学术研究应该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今天的学术界应该理解并继承黄海章的学识、人品与风骨,将先生的道德文章发扬光大,延续中华文化的学术传统。

【责任编辑:李青果;责任校对:李青果 张慕华】

① 陈平原、查建英《陈平原访谈:关于八十年代》,《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6期。

②⑨ 王水照《文学所“何其芳时代”杂忆》,《东方早报》2013年12月1日。

③④⑤⑥⑧ 黄海章《漫忆平生》,第325,325,325,325,323页。

⑦ 承学《黄海章教授谈治学》,《学术研究》1986年第4期。